

日本 历史与文化论集

王金林学术论文选编

浙江工商大学中日文化比较研究所 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日本 历史与文化论集

王金林学术论文选编

浙江工商大学中日文化比较研究所 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集：王金林学术论文选编 / 浙江
工商大学中日文化比较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
所编.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9

ISBN 978-7-5563-0062-4

I. ①日… II. ①浙… ②天… III. ①日本-历史-
文集②文化史-日本-文集 IV. ①K313.07—53
②K313.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6410 号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钟会兵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300191

电话/传真：(022)23366354

(022)23075303

网 址：www.tass-tj.org.cn

印 刷：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25

字 数：40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一

今年是王金林先生 80 大寿,学界早早就酝酿着为王先生祝寿,并出版论文集,以纪念先生在中国的日本史研究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弘扬学术,激励后学。作为晚辈后生,本应借此检讨自己,向王先生学习,无奈先生命我为论文集作序,推辞不下,我只得写下这些年来品味先生学术人生的点滴感受。

王金林先生早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天津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前身)工作。受我国日本史研究泰斗吴廷璆先生的影响和熏陶(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吴先生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研究室主任,同时兼任天津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主任),走上日本史研究的道路,从此风雨兼程、孜孜不倦,在这条道路上艰苦跋涉了 50 余载。

1982 年初,我从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毕业时,正值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招聘研究人员,并被时任副所长的王金林先生选中,将我招致麾下,从事日本史研究工作,成为我终身的职业。不过,由于进所后我选择了日本战后史的研究方向,此后又从事了一些行政管理工作,所以直接接受王先生学术指导与教诲的机会并不多。尽管如此,由于王先生是研究所的领导,又同为日本史研究,所以对先生的学术追求与建树,还是有所了解并十分仰慕的。

在我看来,至少在三个方面,王先生是中国的日本史学界的楷模,为我们这些晚辈后生做出了榜样,值得我们终生学习。

首先,对学术的执著。王先生 1962 年大学毕业后即从事日本史研究,其主要学术研究方向是日本古代史。在其踏入研究领域不久,即发生了“文革”,耽误了青春年华。“文革”结束后,他抓紧时间,忘我工作,出版了《简明日本古代史》《古代日本——以邪马台国为中心》

(日文版)等学术著作,发表了《日本古代部民的性质》《论大化改新后日本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等多篇至今仍有影响的学术论文。此后,先生的学术方向进一步拓展,在日本文化史、中日关系史方面,出版了《唐文化与奈良文化》(日文版)《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弥生文化与古代中国》(日文版)《邪马台国与古代中国》(日文版)等著作。退休以后,先生仍然笔耕不辍,或出访日本、中国台湾,进行学术交流,或活跃在科研与教学一线,继续为我国的日本史研究默默奉献。其间,先后出版了《日本人的原始信仰》《日本神道研究》和《日本中世史》(上、下)等著作,可谓著作等身。如今已80高龄,仍然有论著不断问世,这在中国日本史学界是不多见的。

其次,对中国日本史学会的贡献。中国日本史学会于1980年在天津成立,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成立最早的国别史学会之一。王先生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并为学会的成立上下奔波,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学会成立后,办公地点设在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王先生作为学会副秘书长,主持学会的日常工作。此后,王先生又先后担任学会的秘书长、副会长、常务副会长和名誉会长。其间,在广大日本史研究界同仁的支持下,由王先生推进,中国日本史学会编印了《日本史研究通讯》,组织撰写《中国日本史研究丛书》和《日本史辞典》等,并先后召开了“大化改新中日学术研讨会”、“走向国际化的日本”等一系列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不仅致力于提高中国日本史的研究水平,也将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推向了世界。与此同时,中国日本史学会聚集了广大日本史学者,成为了中国日本史学者之家,为他们交流与提高架起了桥梁。

第三,对后学的提携。王先生的主要学术生涯不在大学,因此真正师承意义上的学生并不多。但是,在中国日本史学界,许多年轻的学子都深受王先生的教诲与提携,并受益终生。20世纪80年代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有科研人员近30人,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居多,从科研选题,到查找资料、修改论文,许多人都是王先生手把手教出来的。当年,我们都是王先生府上的常客,一杯上好的龙井,聆听王先生的学术见解,还要捎上几本珍贵的资料书,捧回去研读。王先生接受了重要的科研项目,总是优先照顾给不容易拿到项目的年轻人,让他们放手去做,并悉心指导。在学会工作中,王先生也是力推年轻人,主

张给年轻人更多的成长和锻炼机会,使学会工作生机勃勃,后继有人。在王先生悉心指导和奖掖下,一大批青年学者已经成长起来,并成为我国日本史研究的重要力量。

如今,王金林先生的《日本历史与文化论集》出版了。这是从王先生的数十篇论文中选编出来的,通过这些论著,可以从中了解先生的学风和基本学术观点。我自知没有资格评论先生的学术,我只是想说,让我们在品味王先生学术成就的同时,也品味一下先生的学术人生,以激励我辈后生学习楷模,献身学术,将我国的日本史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

祝福王先生健康长寿、学术之树常青!

张 健

2014年5月于天津

序二

酝酿多时的《日本历史与文化论集》行将臧事，我等有幸先睹为快，成为第一读者。说实话，此时的心情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该书辑佚了王金林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中的沧海遗珠，或可聊表对先生八十大寿庆贺之情于万一；忧的是，先生面命撰写序文，晚辈为长辈祝寿，古往今来，天经地义，而为长辈著述撰序，诚惶诚恐之至。无奈固辞不获，只能以小文聊以塞责。

已记不确切初识先生的具体时间和空间，或是同行加乡谊的缘故，在我的记忆中，先生早就是我等研究所的一员。20世纪九十年代，先生是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座上宾，进入浙江大学时代后，更是频现先生的身影：或主持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那时研究所主要成员经常赴日，一去一年半载，这时往往将研究生“寄养”给先生。而先生仁心宅厚，视同己出，呵护有加，为浙江大学培养出众多的研究生。如今，昔日得到亲炙的学生多在浙江等地晋升为教授、副教授，成为我国日本学教学与研究的栋梁之才。

还有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有感于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的言行，2001年研究所决定编写一部《日本历史》。该书共分15章，上起日本早期社会，下至走向国际化时代的日本，时间紧，任务重，先生焚膏继晷，字斟句酌，从章节设计，到稿件审定，占用了大量的时间，不少书稿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先生批改的蝇头小字。但在出版时，先生对名利固辞不受。老一辈学者的道德文章，令人肃然起敬。

最令人感念不置者，赖先生推挽之力，我等得以加入中国日本史学会。该会成立于1980年，是中国研究日本史的唯一全国性学术团体。先生作为创始人之一，热心推荐入会，并使我等在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理事会中忝为副会长、专业委员会会长、副秘书长和常务理

事等职,促进了“浙东游击队”融入全国性学术团队的进程。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第二代日本史学者,先生怀着强烈的使命感,自强不息,争分夺秒,在中日两国出版了十余部专著,七部合著和译著,著作等身可谓名副其实。先生付出的是全部心血,收获的是一生快乐,就投入与产出而言,实在是百分之百的赢家。而先生对日本史学会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日前,笔者在网上邂逅先生25年前撰写的一通亲笔信。其中谈及学会工作和学界动向,现全文摘录如下:

□□

您好! 问候全家春安!

来信敬悉。有关“明治维新会”,自贡方面已来信,现转上。我已先给李生奎同志回了一信。大意是:

①我会拟在自贡开“明治维新国际学术讨论会”,时间拟在秋天,最好10月(他说8月),8月恐一切准备不及;

②经费按他的要求办;

③会议由学会和自贡市联合召开;

④关于中宣部审批事,不必走市—省—中央。此事中宣部已下放中(国)社科院,我学会可办;

⑤会议规模50人左右,其中日本国学者十余人;

⑥今后让他直接与您联系。

学会总结预算事,一定照办,勿念!

近来,我已干和正干几件事:①给□□看博士论文(已完);②为王安隆、王家骅主编的《日本人与日本文化丛书》写了一篇书评(已完);③正在写一篇论文,拟题《以长安为中心的东亚唐文化圈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准备参加陕西师大召开的“长安、东亚、环太平洋文化讨论会”;④为《日本史□典》忙碌。

据李洁萍说,您们初(出)的《日本史辞典》已卖尽。他们近日将我去年为该辞典写的书评拟拿去发表,以扩大影响,看能不能再版。

春节以来,忙忙碌碌,像没头苍蝇,计划中事一再被打乱。实在没有办法。

宗平同志译成《北京志》一书,特表祝贺!

《日本历史人物传》近期内准寄去。

匆匆写就,余言再叙。敬颂

撰安!

金 林

1989.3.5

这通写在“天津市历史研究所”信笺上的信函,纸短意长,含有丰富的学术信息。首先提及3项学会工作。一、1989年金秋在四川自贡召开“明治维新国际学术讨论会”。该会或受某些因素的影响,无疾而终。但作为学会一项正式的国际学术会议,未见《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李玉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等史料记载,应该被铭记。二、编纂《日本史辞典》。该辞典为1980年中国日本史学会首届理事会上确定的学会6项研究重点之一,1983年启动,后于1992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题签苏步青,主编吴杰,副主编王金林、沈仁安、吕万和、张玉祥,撰稿人有王新生、刘毅、米庆余、汤重南、孙仁宗、李玉、李卓、杨栋梁、宋志勇、宋成有、沈仁安、张健、赵建民、赵德宇、蒋立峰等79人,系中国学者编纂的首部日本史辞书。三、已出《日本历史人物传》。该书由“古代中世篇”和“近现代篇”两卷组成,前者由伊文成、王金林、贾玉芹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后者由伊文成、汤重南、贾玉芹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信中还提及3种著作。一、《日本人与日本文化丛书》。武安隆、王家骅主编,由《美国人和日本人》(尾崎茂雄著,张健、李卓译)、《日本人和犹太人》(扎伊亚·卞达森著,王健宜等译)、《傲慢的日本人》(新加坡陆培春著),以及《中国人与日本人》(松本一男著,周维宏、祝乘风译)等4种组成,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年推出。二、《北京志》。指《清末北京志资料》,原名《北京誌》,由北京大学堂正教习文学博士服部宇之吉等16人1907年完成,翌年清国驻屯军司令部在博文馆出版。该书张宗平、吕永和译,吕永和、汤重南校,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三、《日本史辞典》。当指《日本历史辞典》,竹内理三等编,沈仁安、马斌等译,参加校译的尚有汤重南、李玉、马新民、宋成有、吕永和等人,198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日本学研究可谓是起步伊始,百废待兴。但这通普通的信笺,不经意间向我们透露出中国日本史学界的勃勃生机。在希望的田野上,先人们积极翻译日人成果,编纂辞典传记,发愤图强,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播下了辛勤的种子。如今,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开来之业,当由后人继之。

王宝平

甲午年七月于东京日暮里

目 录

序一	张 健 (1)
序二	王宝平 (1)

历史篇

关于邪马台国的若干问题	(3)
从考古学看邪马台时代的日本	(12)
走向东亚国际舞台的大和王权	(23)
试论圣德太子的思想	(39)
日本古代部民的性质	(47)
论大化改新后日本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64)
遣唐使的使命	(87)
日本中世政权的性质	(96)
试论源赖朝	(107)
安藤昌益社会观的历史价值	(124)
日本战国大名的治国之策	(134)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太政官制和内阁制的确立	(146)
近代天皇制的理论结构	(155)
战后天皇制及其存续的原因	(168)

文化篇

古代中国的沿海文化与日本文化	(183)
吉野里王国和古代中国的江南文化	(192)
有关三角缘陈氏镜的若干问题	(197)
唐代的文化开放政策及其对日本奈良文化的影响	(212)

日本对唐文化的改造、创新及奈良文化对唐的逆输出	(230)
日本古代天皇制的精神结构	(240)

宗教篇

唐代佛教与奈良佛教之比较	(255)
鉴真在日本	(271)
日本佛教的律学、律仪的形成和发展	(281)
日本镰仓幕府的佛教政策与镰仓新佛教	(296)
皇室神道的形成与天皇的神化	(326)
日本伊势神道的形成及其思想	(340)
程朱理学传入日本与林罗山的儒家神道观	(357)
江戸幕府末期日本的国学和国学神道	(366)
明治前期神道的国教化	(375)
王金林简历及部分著述目录	(384)
编后记	(390)

历史篇

关于邪马台国的若干问题^①

近年来,随着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深入,邪马台国问题也引起了许多中国学者的重视。和日本史学界一样,中国学者间对邪马台国问题的观点也是不一致的。就邪马台国的所在地来说,也有九州说和畿内说的分歧。

我是主张九州说的中国学者之一。今天,我不打算在邪马台国的所在地问题上赘述,只想就所在地以外的若干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邪马台国建立的年代

学者们一般都认为邪马台国建立于公元 2 世纪末,或 3 世纪初。根据史书记载分析,我认为邪马台国建立的年代还可以提前一个世纪,即大约是 1 世纪末 2 世纪初。且看如下史料:

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卑弥呼……,共立为王。^②

灵帝光和中,其国乱,递相攻伐,历年无主,有女子名卑弥呼……其人共立为王。^③

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④

以上三条史料说明:(1)女王卑弥呼之前,邪马台国国王是一位男

① 本文系 1984 年 6 月日本别府大学学术讨论会上所做的报告。其中提出的“邪马台国和前大和国併存说”,受到日本学界的极大关注。

② 《后汉书·倭国传》。

③ 《太平御览》。

④ 《魏志·倭人传》。

王,他统治了七八十年之久,接着发生了内乱,卑弥呼上台;(2)卑弥呼担任国王的时间大约是在中国东汉桓帝和灵帝统治时期。汉桓帝,公元146年至167年在位。汉灵帝,公元168年至188年在位。《太平御览》的记载更明确地指出,卑弥呼是在“灵帝光和”期间即位的。“光和”是汉灵帝178年至184年间的年号。据此可知,卑弥呼即位的具体时间当在2世纪70年代前后。若以2世纪70年代为基准,往上倒退七八十年,便是邪马台国建立的时间,当在1世纪末2世纪初。

如果这一推算成立的话,那么,《后汉书》所载“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中的“倭国”,以及朝鲜《三国史记》所载公元123年“与倭国讲和”中的倭国,大概就是初期邪马台国。“国王帅升”就是卑弥呼以前的男王。邪马台国男王,在统一初期,积极遣使同汉、新罗交往,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要借助外国道义上的支持,以巩固国内的统治;二是要积极吸取汉、新罗的统治经验,以便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新的统治机构。

邪马台国建立的时代背景

以上依据文献记载,推算出邪马台国建国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那么,这一推算与考古发掘的情况是否吻合呢?我认为吻合的。

众所周知,日本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受大陆^①先进文化的影响,生产力获得了迅猛发展。日本人民创造了绚烂的弥生文化。这种弥生文化首先发端于北部九州。弥生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水稻耕种和铁器的应用。农业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进步,使人的个体劳动能力大大提高。由于与农业发展相适应的水利灌溉设施的修建和使用逐渐地需要同一地域的许多氏族共同联合起来同大自然做斗争,这样,在氏族共同体的基础上,地域关系的联络便逐渐形成。就在地域联络的基础上,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前后,日本列岛上,特别是北部九州地区,出现了许多以地缘为核心的小国。关于这些小国的情况,贺川光夫教授做了出色的论述。他在《原始小国群的瓦解和古代国家的成立过程》一文中^②详细地叙述了福冈县朝仓郡夜须町考古发掘的情况。

① 大陆:本书中的大陆指中国与朝鲜半岛。

② 《生活と科学》13,1981年。